



编



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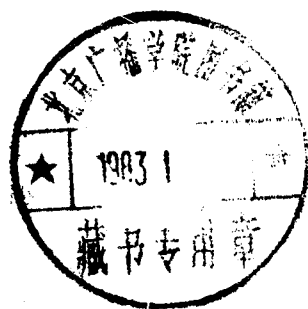
刊



谈

北 京 出 版 社

編輯雜誌



北京出版社

编辑杂谈

本社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53,000 字

1981 年 10 月第 1 版 1982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6,001—28,000

书号:17071·11 定价:0.57 元

目 录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生活	茅 盾〔1〕
鲁迅先生与编辑出版工作	臧克家〔39〕
韬奋在香港创办《大众生活》	程浩飞〔62〕
从读者、撰稿人到编辑	
——回忆我和三联书店的一些联系	戈宝权〔67〕
编辑忆旧	赵家璧〔76〕

杂 家

——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	骆 漠〔88〕
再论“杂家”	罗竹风〔91〕
要做杂家	叶圣陶〔96〕
“编辑”这一行	张惠卿〔98〕
漫谈“杂”和“专”	金 如〔103〕

做好作者工作是办好刊物的重要保证

张伯文 曲涌泉〔171〕

尊重老作家，培养新作者

——从孙伏园的编辑工作谈起 陈漱渝〔178〕

编辑和读者的思想交流

——从《奔流》编校后记想起 仲 民〔181〕

编辑加工十忌

王笠耘〔184〕

编辑要熟悉的几项校对业务

张家璋〔192〕

关于知识读物的编辑工作

王自强〔196〕

政治理论读物的编辑工作

王开基〔205〕

谈谈革命历史题材读物的责任编辑

工作

杨燕杰〔209〕

农业技术读物编辑工作的体会

李贵玉〔214〕

谈谈翻译书稿的编辑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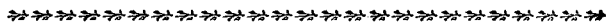
张光璐〔219〕

提倡编辑写点东西

王 兵〔222〕

后 记

〔225〕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的生活

◇ 茅 盾

一九一六年八月初旬，我到上海，先找个小客栈住下，然后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请见总经理张元济（菊生）先生。我和张元济并无一面之识，我只带着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壮（伯恒）的一封给张元济的介绍信。我和孙伯恒也不认识，是我的表叔卢学溥（鉴泉）把我荐给孙伯恒的。当我在本年七月回家时，还不知道祖父应母亲之请写信给卢表叔请他为我找职业，也不知道母亲另有信给卢表叔，请他不要为我在官场（当时卢表叔是北洋政府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在当时的政派中属于梁士诒一系，与叶恭绰友善）或银行找职业。（我在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读书的第二年，我的一个堂叔刚从中学毕业就由卢表叔介绍进了中国银行当练习生。）因为有此种种缘故，当我在本年七月底回到家中时，母亲把找职业已托了卢表叔的事告诉我，并说准备在家闲居半年，因为除了官场和银行界以外，卢表叔未必马上能为我找到合适的职业。却不料八月初就收到卢表叔的信，内附孙伯恒给张菊生的信，并嘱赶快去见张总经理。卢表叔的信中还提到张元济翰林出身，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之一。

现在且说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找一个售货员

问总经理办公室在哪里。发行所顾客拥挤，那个售货员忙于卖书，只把嘴一努道：“三楼。”上三楼要从营业部后面一个楼梯上去，我刚到楼梯边，就有人拦住，问，“干什么？”我答：“请见张总经理。”那人用轻蔑的眼光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冷冷地说：“你在这里等罢。”我真有点生气了，也冷冷地说：“不能等候。我有孙伯恒的介绍信。”一听“孙伯恒”三字，那人立刻面带笑容问道：“是北京分馆孙经理么？”我不回答，只从口袋取出印有“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红字的大信封对那人一晃。那人的笑容更浓重了，很客气地说：“请，三楼另有人招呼。”我慢慢地走上三楼时，回头往下一看，果然在那人对面的一条板凳上坐着两个人，想是等候传呼然后可以上楼的。我心里想，好大的派头，不知总经理的威严又将如何？

到了三楼，觉得这所谓三楼同二楼（那是我没有进去的，只在门外经过，里边人声嘈杂）或一楼（即门市部）颇不相称。三楼矮些，又小些，门前倒有较大空地，一人坐在长方桌后，见了我，就说：“先登记。什么姓名？”我答：“沈德鸿。”那人又问：“三点水沈，是么？什么，得？”我答：“是道德的德。”又问：“三点水共字的洪罢？”答曰：“不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鸿。”那人摇头，表示不了解。我又说：“是翩若惊鸿的鸿。”那人睁大了眼，我看他面前的登记簿上，本日已登记到十六号，而我将是第十七号，而此时不过九点钟，可知总经理已会过至少十六个客人了。此时忽听有人说：“是江鸟鸿。”我回头一看，管登记的那个人对面靠墙板凳上坐着四个人，显然是等候传见的。登记人皱着眉头说：“江鸟鸿，人人都懂，你偏不说。什么事？也得登记。”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个大信封来。登记人接过去一看，霍地站了起来，口里念道：

“面陈总经理张台启 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这个墨笔写的大“孙”字恰恰写在红色印的“馆”字上面。登记人满面笑容对我说：“我马上去传达。”推开门进去了。

我正在想：原来他们把鸿拆成江鸟；登记人已经带一个人出来，低声对他说：“请稍等候。”又侧身引路，对我说：“请进。”我进了门，他就把门关上了。

我见这间总经理办公室前面一排窗，光线很好，一张大写字台旁坐着一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想来就是张元济了。两旁靠墙都有几把小椅子（洋式的，圆形，当时上海人称之为圈椅，因为它的靠背只是一道木圈），写字台旁边也有一张；张元济微微欠身，手指那个圈椅说：“坐近些，谈话方便。”我就坐下。张先问我读过哪些英文和中文书籍，我简短扼要地回答了，他点点头，然后说：“孙伯恒早就有信来，我正等着你。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如何？”我说：“可以。”张又说：“编译所在闸北宝山路，你没有去过罢？”我表示不知道有什么宝山路。张拿起电话，却用很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谈话。我听他说的是：“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今日来了，一会儿就到编译所见你，请同他面谈。”打完电话，张对我说：“你听得了罢？刚才我同英文部长邝博士谈你的工作。现在，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你住在哪个旅馆？”我把旅馆名和房间号码都说了，张随手取一小张纸片记下，念一遍，又对我说：“派去接你的人叫通宝，是个茶房，南浔镇人。你就回旅馆去等他罢。”说着他站了起来，把手一摊，表示送客。我对他鞠躬，就走出他的所谓办公室。

我回旅馆，把简单的行李理好，此时已是九点半。我回

想总经理的办公室，朴素得很，墙上不挂任何字画，大写字台对面的长几上却堆着许多书报，中、英文都有。

等了一会儿，通宝来了，帮我把行李装上一辆相当漂亮的小汽车，就对司机说：“走！”我以为是出租汽车，通宝说：“这是总经理的车子，出租汽车哪里去找？如果坐黄包车，起码一小时，那就误了事了，是总经理派汽车接我到河南路，又叫原车送我们到编译所。”我有点惊讶地说：“啊！你是编译所茶房。”他点头，又说：“我是南浔人，南浔离乌镇二九路（即十八里），我们也算同乡，你到编译所办事，有什么事，找我就好了。”我听他的口气不小，猜不透他是什么来头，后来才知道他是编译所茶房的头头，也可以说是编译所茶房的元老，编译所的茶房清一色南浔人，都是他引进来的。

到了宝山路，把我的行李卸在一座半洋式二层的房子里（这房象是宿舍，此时只有一个小茶房看守房子，见了通宝，十分恭敬），立刻到编译所，会见英文部长邝富灼，说是安排我在英文部新近设立的“英文函授学校”，担任修改学生们寄来的课卷。此时英文部一共才有七个人，部长邝富灼，“函授学校”主任周越然，编辑平海澜、周由廛（周越然的哥哥），改卷员黄访书（广东人，邝富灼引进来的），办事员（等于练习生）胡雄才，加上个刚来的我。这七个人中，部长是华侨，原籍广东，外国大学毕业，得博士，大约四十多岁，广东话也不大熟练，只说英语。二周兄弟，胡雄才，都是湖州人，他们把我看成同乡。平海澜是上海人，原浦东中学英文教员。英文部中大家说话，多用英语。

编译所在长方形的三层大洋楼的二楼。三面有窗，进门先是三个会客室，半截板壁隔成，各有门窗。一道板壁把这

些会客室和编辑部大厅分开。这个大厅内有英文部、国文部、理化部、各杂志编辑部，但因各部人数多少不等，而大厅只有如许面积，不能隔成有规则形的小房，只能在统间混合办事，乍一见时，大小桌子横七竖八，挨得很紧，人声嘈杂，倒象个茶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也挤在这“桌阵”中，并没专用的办公室。

桌子是两种格式，一是老式的七只抽屉的写字台，又一种是长方形两个抽屉的普通中式书桌。各部部长、各杂志编辑主任，还有“英文函授学校”主任周越然，都用写字台，高梦旦也用同样的写字台，但英文部部长邝富灼用的，却是大型的最新式有卷帘木罩的写字台。这个写字台的台面三分之一装有高约二尺的木架，分成许多小格，备放各种文件，卷帘木罩就装在木架顶上，把它拉下，就将整个台面罩住，有暗锁。台主人离去时只要将卷帘式木罩拉下，台面上文件任其放着，上了锁，就同放进柜子一样保险。

我的第一天工作很轻松，只改了四五本卷子，这些学生英文程度不一，最高的不过相当于中学二年级。“函授学校”此时只有初级、中级两班，高级班讲义尚在编写。这个“函授学校”只有半年历史，是周越然提议创办的。据说英文部原来只有三个人：邝富灼、周越然、黄访书。平海澜、周由廬、胡雄才，不过比我早来几个月。

胡雄才同我年龄不相上下，可是社会经验比我多。他只读完中学，做过学徒。他的薪水只有每月十八元，而我的，是二十四元；据他说，这是“编译”一级最低的工资。照例，工作一二年，可以加薪，五元为度，如此递加，最高可达六十元，但那时你大概已在编译所熬上十多年。胡雄才又说，

也有一进来就享受五十元以上高薪待遇的，那都是已在社会上做过事，薪水高，请他进来如果薪水反低了，他肯么？但这，又要看介绍人的来头，如果介绍人就是编译所中的高级职员，也要看他的地位和势力。例如周由廬，他是周越然的哥哥，而周越然在英文部势力极大，除了部长就数他，而况他又是创办“函授学校”的建议人，为商务印书馆开辟一条新的生财之道，宣传之路，此时风头正健。周由廬本人呢，在湖州的湖郡女校（一个教会办的贵族女子学校，毕业后可以由学校保送美国留学）任教多年，本来薪水每月百元。平海澜情况相同。黄访书已来了多年，又是部长介绍的，此时亦不过四十元一月而已。

胡雄才又盘问我：“你与总经理是不是亲戚？”我说“不是”，他不信，反问道：“你说不是亲戚，可是自有编译所以来，从没听说一个起码编辑是坐了总经理的专用汽车并由茶房头脑伴送来的。”我不和他多辩论，因为在他看来，他的推论是合理的，而且社会的风气也确是这样的。

胡雄才又悄悄告诉我，编译所中有好多人月薪百元，但长年既不编，亦不译，只见他每天这里瞧瞧，那里看看，或则与人（和他同样的高薪而无所事事者）咬耳朵说话；这些人都有特别后台，特殊社会背景，商务老板豢养这些人，是有特殊用心的。

这些内幕情况，使我不胜感慨；我的母亲写了极诚恳的信，请卢表叔不要把我弄到官场去，真料不到这个“知识之府”的编译所也是个变相的官场。

胡雄才使我大开眼界，因此，在英文部中，我和他最亲密。我在改卷之外，尽有余闲，我常常看一本石印小字的翁

（元圻）注《困学纪闻》，那是进商务之前，准备在家闲居半年的时候看起头的。胡雄才又悄悄警告我：这与我一二年后的考绩（即加薪）有关；老板们（他这里说的老板，指各部部长及有势力有地位的“帮闲”式编辑）不喜欢人家（小职员）不务正业。

在宿舍，同一卧室的谢冠生，也使我开了眼界。从他那里，我才知道这个宿舍并非商务印书馆办的，而是茶房元老通宝同他的儿女亲家福生（也是南浔人，资格仅次于通宝）的合股公司。福生俨然是这个宿舍的经理，厨子、两个打杂的小青年都得听他的。谢冠生又告诉我：编译所中的国文部（部长庄俞，武进人）专编小学和中学教科书的人是清一色的常州帮。（国文部还包括一些无类可归的高级编辑，那就不受庄某领导而且各省各地人都有。）理化部是绍兴帮，除了校对之类少数人也许不是绍兴人。谢冠生自吹他所属的“辞典部”

（先编《辞源》已完成，现在编《人名大辞典》、《地名大辞典》等等）却不是什么帮，而是量才使用的。不过，他的薪水大约不过四十元左右，所以屈居于这个宿舍，而且常常透露不久将舍此而另找出路的意思。谢懂法文，中文自然有基础，故得厕身于“辞典部”。二三年后，他果然离商务，据说在上海进修法文，后又留学法国；蒋介石时代，他是南京政府的司法院下的司法行政部部长。

谢冠生所讲，使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张菊生（总经理）的轶事。据他说，张来自浙江省海盐县名门望族，少年科举得意，翰林散馆后任京官，戊戌维新时，他虽非康、梁一派，但赞成维新，曾蒙光绪召见，曾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政变后，他逃出北京，暂寓上海养晦待时。因偶然机会，得识夏

粹方、鲍氏三兄弟，就帮助夏办起中国第一个新式出版机构。夏粹方原是上海《字林西报》排字工头，那时能排英文的工人绝少，所以工资高（商务印刷所的英文排字工人的工资比排中文的高约一倍）。积资既多，自己办一个小印刷所，招收宁波工人十来名，名为商务印书馆，主要业务是招揽小件印刷品，并不是出版机构，但颇有盈余。约在一九〇〇年左右，扩充资本，翻印了一些英文课本。一九〇二年后，方设立编译所，一九〇三年张菊生任编译所长。

在辛亥革命前，商务有日本人投资，占全部资金之一半。印刷、编译都有日本人参加，引进当时日本已经掌握的先进印刷技术，以及日本当时编辑小学、中学教科书的经验。辛亥革命时，中华书局崛起，以完全中国资本自办的出版事业为号召，又揭露了商务的中日合伙的事实。于是夏粹方、张菊生决心收回日本人所占有的资金，与日本资方办理拆股交涉，几经曲折，始得成功；印刷、编译两方面之日本技师和顾问也全部辞退。

商务印书馆就以完全中国人资本、中国人管理的新式出版企业名义，号召投资，开始扩大业务范围。此时的商务印书馆除河南路的发行所大楼，又有宝山路编译所大楼和印刷所厂房，能制照相铜版、锌版、铜模和浇铸铅字。

在我进编译所的前两年，张菊生曾周游欧美各大国，考察他们的出版事业，同时还以商务印书馆的名义，同一些英美出版公司订合同，作为他们的书籍在中国销售的代理人。

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衲本二十四

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书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修养。

我在英文部工作已有一月了，我并不讨厌机械式的改卷，反倒喜欢这里的必说英国话的“怪”现象。我以为这可以提高我的英文口语的能力。在北京大学预科时，虽然洋教员（教外国历史、教英国文学的）有四五名之多，但我的英文的口语总不好，同学中大都如此。

我从谢冠生那里看到了当时正在发行的《辞源》，忍不住给张菊生写了一封信。当然，信是文言的，那时还没提倡白话。这封信开头赞扬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常开风气之先，《辞源》又是一例。次举《辞源》条目引出处有“错认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学不方便。最后说，许慎《说文》才九千数百字，而《康熙字典》已有四万多字，可见文化日进，旧字不足应付。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化突飞猛进，政治、经济、科学，三者日产新词，即如本馆，早已印行严译《天演论》等名著，故《辞源》虽已收进“物竞天择”、“进化”诸新词，但仍嫌太少。此书版权页上英译为《百科辞典》，甚盼能名实相符，将来逐年修改，成为真正的百科辞典。这封信交给通宝随同编译所每日应送请总经理过目或核示诸文件专差送去。我写此信，是一时冲动，事前事后，都未对人说及。但在那天晚上，在宿舍里，谢冠生悄悄地对我说：“你那封信，总经理批交辞典部同事看后送请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核办。”我真意想不到，这么一封平常的信，引起那样大的注意。说老实话，这封信我是随便写的，寥寥二百余字。如果我想炫才自荐，可以引经据典，写一二千字呢。

次日上午，高梦旦在小会客室叫我去谈话。高梦旦天天来编译所办公，似乎今天他才知道编译所有我这么一个人。这也难怪，我进英文部是张菊生直接和邝博士谈妥，而且第一天进编译所便到英文部，邝亦未引我去见高所长，因为他知道高梦旦是不拘小节的。当时高梦旦开门见山就说：“你的信很好。总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其材，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毓修，合作译书，你意下如何？”我并不认识孙毓修，当我童年时，孙毓修编的童话尚未出版，这些童话大部分是从英文童话意译来的，用白话，第一本名为《无猫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儿童文学。我猜想这位孙老先生大概懂英文，同他合作译书，不知怎样做法，译什么书？不过我也不多问，只说：“我愿意。但先须向邝部长说明，向他告别。”高梦旦说：“我同你去，邝博士还不知道要调你呢！”

见过邝富灼，我谢他一个多月对我的照顾（这是真话，一个多月来，他对我很客气，象对二周和平海澜），然后，高梦旦引我去见孙毓修，只说句“你们细谈吧”，就回到他那背阳的大写字台旁坐下。

孙毓修年约五十多，是个瘦长个子，有点名士派头。他是前清末年在商务编译所任职，是个高级编译。他似乎又有点自卑感；后来我才知道这自卑感来自他的英文程度实在不算高。他不问我对翻译感兴趣否，也不谈合译什么，却自我介绍道：“我是版本目录学家，专门为涵芬楼（编译所的图书馆）鉴别版本真伪，收购真正善本。有暇，也译点书。有一部书，我译了三四章，懒得再译了，梦旦先生说的合译，就指这个。”我说：“是什么书？莎士比亚的戏曲？还是……”

孙毓修插口道：“不是，你看。”他从书桌上杂乱的木版书中找出一本英文书，我一看是卡本脱（他译音为谦本图）的《人如何得衣》。孙又从抽屉找出一束稿纸，是他译的该书前三章。他说他的译笔与众不同，不知道我以为如何？我把他译的那几章看了一下，原来他所谓“与众不同”者是译文的骈体色彩很显著；我又对照英文原本抽阅几段，原来他是“意译”的，如果把他的译作同林琴南的比较，则林译较好者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不失原文的面目，而孙译则不能这样说。孙毓修老先生以前曾以同样方法，“译”过卡本脱的《欧洲游记》，颇受读者欢迎，因为借此可以知道欧洲各国的简单历史、风土、人情等等。我想，林译的原本是西欧文学名著，而孙已出版的《欧洲游记》和译了几章搁起来的《人如何得衣》不过是通俗读物，原作者根本不是文学家，不过文字还流利生动，作为通俗读物给青年们一点知识，倒是当时欧美社会所需要的，所以在欧洲也曾列于畅销书之列，再加以出版商的广告吹嘘，也曾哄动一时，但料想是不过几年就会被人遗忘了。

我想了一会就说：“老先生的文笔别具风格，我勉力续貂，能不能用，还得老先生决定。”孙毓修自负地笑道：“试译一章看吧。”我重读了孙老先生“译述”的前三章原稿，就用他的意译方法，并摹仿其风格，以三四天时间译出了一章。当我把原稿交给孙时，他带点轻视的意味说了一句：“真快。毕竟年轻人精力充沛。”可是他看完了原稿后，笑道：“真亏你，骤看时仿佛出于一人手笔。”我说：“惭愧。还得请你斧削。”他又自负地点了点头。可是执笔沉吟半晌，只改了二三处几个字，把原稿还给我，就说：“你再译几章，会更熟练些。”我问他：“不跟原书校勘一下么？也许我有译错之处。”他摇头道：“本